

『志愿军的制胜法宝』：零敲牛皮糖

□ 李志萍

在 70 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依据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指导战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牛皮糖是我国南方民间用麦芽糖制作的食品，整块吃很难嚼烂，对付它的办法，就是把它敲碎，然后一块块地吃。所谓“零敲牛皮糖”，就是将暂时强大的敌人比作牛皮糖，通过打小歼灭战的战法，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将其消灭。它是我军历来提倡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歼灭战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基于战争的特殊条件和经验教训

“零敲牛皮糖”，是在特定的作战环境、与特定的作战对象和战争的特定阶段，提出来的创新性作战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性和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

朝鲜半岛的地理地形条件差。朝鲜为狭长半岛，南北最长直线距离 840 公里，东西最宽距离 360 公里，蜂腰部仅 140 公里，且濒海多山，特别是三八线南北地区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不使我军大兵团实行深远机动的运动战。

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在战争相持阶段，虽然我军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优势，但敌我装备优劣悬殊

的状况没有改变，美军的火炮、坦克等武器装备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大大优于我军，拥有制空权，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机动和协同作战能力强，不宜我实行大歼灭战。

前五次运动战战役的胜利极其艰难。我军在前五次运动战战役中一直采用集中兵力，深穿插、大迂回、分割包围等大歼灭战的战法，虽说每战皆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但胜利并不十分理想，就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基本目标并未得到实现，打的主要是击溃战，歼灭战少。

后方保障制约战役进程和结局。由于我军所需的一切作战物资全靠国内供应，加上交通条件差，敌空中威胁大，物资、车辆损失严重，使得我军历次战役中粮弹供应不足，往往造成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不能继续作战，严重影响达成打开灭战的预定目标。我军的这一弱点，被敌人称为“礼拜攻势”，致使敌采取相应对策应战，即每当我战役发动时，敌即实施有计划的退却，同时采取“磁性战术”，即让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7 天之后便凭装备和空中优势，趁我疲惫和后方供应不及之际进行反攻。

毛泽东及时认真总结了连续五次运动战战役的经验教训，依据对这场战争基本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于 1951 年 5 月 26 日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从历次战役的实际情况看，打美英军和打伪军应有不同，对美英军“目前就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27 日，他在接见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和参谋长解方时指示：抗美援朝战争应该实行小歼灭战，办法就是用“零敲牛皮糖”的方针。

采取狙攻守反灵活多样的歼灭战

“零敲牛皮糖”方针通过志愿军首长的传达和阐述，广大志愿军官兵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坚决贯彻落实到战争实践，依据战场情况不断变化，创造了灵活多样的阵地防御和进攻的小歼灭战战法，取得了显著战绩。

实施“冷枪冷炮”的狙击歼灭战。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具特色的战法，贯穿战争相持阶段全过程。此战法主要是在两军前沿阵地，派出大量的神枪手、神炮手，对敌防御阵地上的敌人，广泛实施“冷枪冷炮”狙击作战，达成逐步歼灭敌人。如，我第 15 军曾在 4 个月内，实施狙击战毙伤布防在金化到铁原的美军近千名官兵；第 60 军不到 2 个月内，实施狙击战毙伤“联合国军” 3100 余人。于是，上甘岭 537.7 高地北面的两个山，被命名为“狙击兵岭”和“狙击棱线”，载入战争史籍。

实施机动性质的反击歼灭战。在战争相持的整个过程中，我军既不易放弃野战阵地，又不单纯死守，采取带一定机动性质的坚守防

御，同敌反复争夺，并在敌被打得筋疲力尽之时，选择其某些突出要点，趁其立足未稳之际，组织有限的反击作战歼灭敌人。

实施小规模进攻性歼灭战。针对敌我阵地犬牙交错的特点进行作战，着重于挤占敌我接触的中间地带，集中力量攻击敌连排支撑点，把作战焦点完全推向敌方阵地，并利用敌对我攻占的阵地“有失必反”及连续反扑的特点，集中优势兵力与敌反复争夺，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

实施防守与攻坚融合的歼灭战。此战法运用最典型、最光辉的范例，就是上甘岭战役。战役引敌 6 万人前来进攻，我军采取坚守阵地防御作战与对敌连排支撑点攻击作战有机结合的战法，达成大量消灭敌人的目的，经过 43 天的反复争夺，毙伤敌 25000 人。

由小歼灭战发展到大规模歼灭战

为了在战场上争取更为有利的态势，迫使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后期在志愿军司令部统一组织和指挥下，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 大”“大小结合”的原则，将“零敲牛皮糖”方针推向一个更高阶段。

贯彻“由小到大”原则，组织战役性规模歼灭战。志愿军为了扩大歼灭战的规模，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实施了战役性歼灭战：即先以一个兵团为单位，在当面之敌中选择若干战术要点进行攻击，时间一般为 7 至 10 天，然后再视情而动；若敌不进行大的反扑，我即以另一兵团在另一地段上重点举行反击战；敌若进行大的反扑，则趁其反扑之机，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火力大量歼灭和消耗敌人。1953 年 5 月至 6 月，我军 5 个兵团在志愿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下，以东线为重点，先分散歼敌 20 个连排支撑点，歼敌 4100 余人后，又攻占敌团以下防御阵地 51 处，毙伤伪敌 41000 余人，实现预定目标。

贯彻“大小结合”原则，实施战略性规模歼灭战。在停战前夕，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的企图，以促成停战谈判目的的实现，志愿军举行了带有战略性的金城反击战。参加的 5 个军组成东、中、西 3 个集团，在 1000 多门火炮的支援下，首先选择金城方向上敌战线，突出部多个高地进行攻击，迅速突破了敌 4 个师的防御阵地，然后实施战略性纵深作战，毙伤伪敌 78000 余人，从而实现了“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最终迫使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洪学智：从“红小鬼”到我军现代后勤奠基人

□ 张 瑜

党走的初心。

公是公 私是私

洪学智一生艰苦朴素，素衣布鞋，粗茶淡饭一直是他生活的常态，从不搞特权，从不谋私利，始终葆守共产党人公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洪学智的夫人张文曾回忆，1941 年，组织上安排她在盐阜军区财务股当出纳，虽然她平时对工作一丝不苟，但还是因为疏忽将现金柜子的钥匙给了别人，导致现金丢失 100 元，当时整个盐阜军区家底只有 4000 元。洪学智知道后极为恼火，足足训斥她一个多小时，还斩钉截铁地说：“丢了钱就要还！就是不吃饭，也要把公家的钱还上！”当时洪学智一家每个月的津贴总共才不到 5 元。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内，每领到津贴，洪学智都全部上缴，全家为此只能天天吃青菜。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虽然当时洪学智是盐阜

军区司令员，但他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家人做任何袒护和包庇，全家坚持省吃俭用还清丢失的全部现金。

洪学智不仅对家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更是极为苛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 7 次返乡，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接受当地政府任何接待，甚至拒绝当地政府提供的保卫工作，每次都是轻车简从，没有任何排场。1953 年 7 月，他时隔 25 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地方领导一再希望他在区委机关食宿，但他坚持住在堂弟洪学成的家里，在亲友家吃粗茶淡饭。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每次回到家乡，依然坚持只住在金寨县政府招待所，这是当时全省条件最差的招待所。他说：“我是金寨人，我来金寨就是回老家了，就是家里人了，回家还要搞排场吗？说不过去嘛！”不仅如此，洪学智办事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制定了“八条铁令”：“1.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2.任何时

意，“所谓提高技术，并非狭义的仅作球艺而论，而是说，在使身体强健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办法，而为将来训练大批军事技术人才作准备”。

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

为了推动红军体育活动的开展，部队各级俱乐部、列宁室经常组织有趣的体育竞赛。红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也常在战斗胜利或各种重大节日期间，举办一定规模的运动会。

为庆祝福建漳州战役胜利，1932 年 5 月 4 日红军在漳州举行了红五月运动会，由红一、五军团参加。运动场是在赛前 3 天，由工兵连和各单位抽调的人员紧急修筑而成。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跳高、跳远、百米赛跑、刺花枪、劈单刀和双刀、投手榴弹等。时间为 3 天，各类运动项目分别进行比赛。

1933 年七八月间，红军的许多部队为了纪念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在 8 月 1 日前后纷纷举行运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全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为避免敌机袭扰，故选择在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地势平缓且远离首府瑞金的永丰县藤田地区举行。红一、五军团选派了 4 个团，另有永丰独立团和龙冈独立营，6 个参赛单位共计 6000 多名选手。兴国、宁都、赣县等县均派出参观团前往学习观摩。赛前成立了筹备处，平整出比赛场地，建了临时新舞台、指挥台、主席台、参观团休息室、救护室等，还就地取材制作了一些简易的篮球架等体育设施。

8 月 6 日举行开幕式。比赛在永丰藤田、瑶田、湖西三地进行，中心赛场在藤田，项目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 4 个方面共 30 余项。体育方面：田赛包括跳高、跳远、单双杠、高低杠等；径赛包括 100 米、200 米、500 米赛跑；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军事体育项目有刺枪、投弹、射击、武装越野和队列等。结束时，由评判组评出各项比赛获胜单位，红一军团二师五团被授予“模范红五团”光荣称号。8 月 14 日闭幕，朱德和周恩来出席并作讲话，向获奖单位与个人颁发了锦旗、奖章和奖品。

这次体育盛会堪称中国军事史、体育史上的伟大创举，标志着红军的体育运动步入了鼎盛时期。此后，“在苏区内，体育运动是一天天地向前开展着。红色的体育健儿，一天天的多起来了”“到处都在举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红军还积极参加苏维埃政府、社会团体、学校等举办的运动会，与工农群众一起开展军民体育竞赛，从而促进了军民团结。

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倡导和参与体育活动

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提倡体育运动，亲自组织体育运动队，为体育赛事作指示，担任体育裁判等。他们还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

当时中央机关的体育活动很丰富，以球类为主，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参加人员十分普遍。各机关还成立了不少球类代表队，如中央政府篮球队、中共中央篮球队、少共中央排球队、中央联合足球队等。如中共中央局篮球队的队员有任弼时（中锋）、邓发（中锋）、方子琴（右锋）、段锡明（左锋）、王德林（前卫）、陈益声（后卫）。可见，许多红军领导人都曾在球场一展身手。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是体育积极分子，几乎每天的休息时间，都要在一张简易乒乓球桌前厮杀一番。

毛泽东深知强健体魄的重要性，不但自己坚持参加跑步、爬山、游泳、打秋千、骑马、体操、爬竿等体育活动，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还常鼓励身边的年轻战士通过锻炼增强体质。他与徐特立、谢觉哉等人一起组织修建了沙洲坝大运动场。担任过体育比赛裁判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陈云、项英、凯丰、邓颖超、何长工、刘伯承等。杨尚昆、王盛荣还是出色的篮球裁判员，每遇重大赛事，都少不了他们上场执哨的身影。张爱萍、施碧晨、汤建、肖华等人经常撰写体育报道，大力宣传体育运动。

最喜欢体育运动的领导人要属朱德总司令，他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体育学堂，当过体育教师，体育项目样样精通，尤其对篮球情有独钟，而且球艺精湛、技术全面，有篮球健将之美誉。朱德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报名参加篮球赛，他在球场上能攻能守，与队友配合默契，传球快、投篮准、运球稳，跨步、投篮、断球都有一套。朱德没有架子，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同场竞技，有时为了轮流上场等很长时间也毫无怨言，故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尊重。他除了直接参赛外，还会在场下与其他战士一起做拉拉队员，为场上的球员加油与喝彩。

红军时期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体育与军事有机融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推广特色鲜明的体育运动，形式灵活、大胆创新，寓教于乐、广受欢迎。此后，我党始终把开展体育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事业也成为服务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总之，体育运动强健了体格，纯洁了队伍，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铸就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大人民军队。

改善。洪学智关心关爱士兵，有心、用心、尽心、精心、全心的为士兵们做好后勤保障，深得广大基层官兵的喜爱，也就有了“洪老头”的外号。

洪学智还十分关心家乡和老区的建设和发展。1995 年，洪学智的女儿洪彦看到报纸上报道有一名来自革命老区的学生，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生活困难，每天只能馒头就咸菜。洪学智听说后感慨道：“革命军队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过群众的支持。当年我们都在老区打过仗，对老区的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如今老区的孩子能考上北大不容易，我们就是节省点，也要为他们做些事情。”于是他决定，在北京生活的 6 个儿女每家负责资助 1 名学生，他和夫人也资助 2 名，每月资助 100 元，直到大学毕业。逢年过节，洪学智还会叫学生们到家里来吃饭，他就像一个慈爱的爷爷，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和成长。洪学智作风正、家风淳，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责任与担当。

